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

*Selective Reading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张中载 王逢振 赵国新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二十世纪 西方文论选读

Selective Reading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张中载 王逢振 赵国新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张中载等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ISBN 7-5600-3018-1

I. 二… II. 张… III. 英语-对照读物, 文艺理论-英、汉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7463 号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

张中载 王逢振 赵国新 编

* * *

责任编辑: 任小玫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6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3018-1/G·1451

定 价: 54.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010)68917826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68917519

前 言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是《西方古典文论选读》(外研社 2000)的续篇。

早在《西方古典文论选读》付梓前,我们就已策划《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的编写。当时想:如果能让这两本书同时问世,最好。因为,从教学考虑,学了“古典的”,还需要学现、当代的,总不能“厚古薄今”。又何况 20 世纪是西方文论最活跃、最发达、流派最多的时期。

《西方古典文论选读》在一些高校使用后,许多师生纷纷询问编者和出版社:何时出版《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催之甚急。这促使我们决定把其他的写作任务放下,立即投入这本书的编写。

这两部书若能同时出版,教学时就可以在同一学年的两个学期中将上下约两千五百年的西方文论尽收眼底。可惜当时拟参与编写《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的三人中有两人因故暂不能参与。这样,一搁就是两年。

2001 年 6 月下旬,欣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2000—2001 年度‘研究生教学用书’审定结果的通知”已将本书编者之一张中载教授所编的《西方古典文论选读》选入“研究生教学用书”。这一喜讯促使我们加快《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的编写工作,以尽早满足全国高校的教学需要。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高校英语系和中文系相继开设了“西方古典文论”和“20 世纪西方文论”这两门课程,讲授西方自柏拉图以降各时期的批评理论。这方面的教材、著作和译著也纷纷问世。

但是,不少高校的英语系却苦于缺乏教材。国内书店里能买到的多是中文版,不合作英语系教学用书。若从国外进口,则价格昂贵,且需外汇。教材的匮乏让不少英语系教师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现在,我国不少高校的英语系已经把“西方古典文论”和“20 世纪西方文论”列为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学生从这两门课中学到的不仅是批评理论(文论),从中学到的是有关西方历史、哲学、美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广泛的知识。

当然,最直接的收益是用学到的文论解读、欣赏、评论西方文学作品。学生反映,学了文论后,视野开阔了,在讨论或书面评论外国文学作品时有得心应手的良好感觉。以 E. M. 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为例:在评论这部小说时,学生能用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等多种批评方法,对其进行剖析。

20 世纪是一个批评理论世纪。在这个世纪,文学批评已经彻底摆脱了“文学作品的寄生虫”的地位,与文学创作平起平坐,并驾齐驱。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让-伊卡·塔迪埃在《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一书中说:“在 20 世纪,文学批评首次试图与作为其分析对象的文学作品平分秋色。”

西方文论有名地难懂。而 20 世纪的有些西方文论更是出奇地难懂。

我国文论强调人的情感和个人经历,关注文采、文体和审美精神,即便是外国人读,也不觉其难。而西方文论则重理论和理性,轻感悟。因为强调逻辑、推理、阐述、论证以及论证的依据,就比较抽象晦涩。西方的大学生、研究生读西方文论也常常叫苦不迭,我们东方人读西方文论有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加之抽象晦涩,读起来艰苦是可想而知的。

要解决我国学生读西方文论之难,是编写本书的另一目的。

为此,我们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精选材料,压缩篇幅。从每一家重要理论流派中选名家名篇;过长的名篇只选其精华,略去可读可不读的段落,使学生掌握某一篇文论的主要论点。

二、简要介绍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理论流派,对于一些入选的文章提供导读性的简介,以利学生读懂原文。

三、注释难点。

每一章中所列的参考书目,既是编写过程中参阅的主要文献,也是深入研究西方文论的读者所必读的。

本书的对象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特别是攻读文学专业且掌握了英语的学生。尚未完全掌握英语的读者,也同样可以以本书的中文部分为起点,学到 20 世纪西方批评理论的概貌和基本知识。

二次大战后的西方文论,正以新的研究方法和观念改变着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传统范式。但是,并非所有流行的西方文论都能为我所用。它们的价值和存活期也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因此,青年学生在学习西方文论时不可没有清醒的借鉴意识和批判意识,切莫以为从西方输入的“洋

货”均能为我所用。

书中选入的 20 世纪西方文论是否选得好,选得恰当,评价是否正确、合适,还请专家和读者多多指正。

本书编写和注释分工如下:

- 张中载:前言,原型批评,新历史主义,全书总审校。
- 王逢振:导言,新批评,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 赵国新: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后殖民主义。
- 王逢振与赵国新:文化研究。

张中载

导 言

所谓导言,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开头,都有一篇或作者、或编者、或请别人写的导言。其目的仿佛是为全书提供某种阅读指导。但谁能完成这一任务呢?即使作者本人,也不过是说出自己的想法,至多算是一家之言。因为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阅读同一部作品时,必然会形成自己不同的见解。导言之类的东西,或许提供指导,或许提供误导,或许只是批评的靶子。因此,当我的合作者把这一任务交给我时,我备感惶恐。然而我又不想违背这一不成文的常规。因此下面所写的只能说是我个人的看法。

—

20世纪是个辉煌的时代,同时也是个苦难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拓展了人们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从微观方面,已经看到了电子排列的方式,揭开了人类遗传基因的密码;从宏观方面,已经进行太空之旅,就不断扩大的、在“大爆炸”中产生的宇宙现象增添了类星体、脉冲星、放射星系和黑洞等概念。这期间,旧观念的修正,新意识的建立,从探测宇宙奥秘到物质生产分配,种种壮丽的想像都增加了实现的可能。但另一方面,20世纪经历了极其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痛苦的余波和不间断的地区战争,重建国家的艰辛和冷战的压抑,这些又是史无前例的苦难经历。人们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种种现实,撞击着他们的心灵,让人产生惊奇、兴奋、痛苦、彷徨等复杂的心情。尤其在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的情况下,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既有模糊的憧憬,同时又感到一片混乱;既张着吞噬一切的大口,同时也展现着无限的未来。于是,人们感到正在出现某种新的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东西。这种意识强烈而真诚,但又抽象而朦胧。因此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探索和认识新事物的方式,或者说方法和理论。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

术革命出现在 18 世纪。16 世纪末以后发展起来的力学是这次革命的理论准备。这次革命使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发展到机器生产。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于 19 世纪后半期。19 世纪中期以后物理学的发展,如电磁学和热力学等,为它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次革命的结果使资本主义早期的机器生产发展到电气化生产。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发生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这次革命的标志是机器生产或电气化生产发展成为自动化的机器生产,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三次革命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因而也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革。第一次革命产生了市场资本主义,第二次革命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次革命则产生了跨国资本主义。换句话说,第一次革命开始了现代化,第二次革命实现了现代化,第三次革命开始了后现代社会。因此 20 世纪的西方文论的主要语境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社会。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20 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正是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体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西方文论受到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方法论的影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直接影响到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其次是社会的发展引起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因而引起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第三是社会条件的变化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实践,引起认知方式和理论方法的发展。这三种情况纵横交错,彼此间也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因此,对待西方文论,应该注意它们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强调关系和过程研究,可以说是各种西方文论共有的特点。

二

这里,也许我们应该对“文论”这个术语加以界定,因为它已经大大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文学理论。其实“文论”一词是中国人在翻译中的一大发明。在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一个专门与之对应的词。我们所说的“文论”,在西方一般指“批评理论”、“理论”、“话语理论”以及现在广义上所说的文化理论。简单说,就是关于文字(包括各种符号)和文本(包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5页。

社会文本)的理论。这种理论的产生和应用与20世纪的“语言转向”密切相关。

从总体上看,过去的文学理论以语言的“表征模式”为基础,即语言模仿、再现或反映现实。也就是说,文学通过语言对现实的模仿和再现,能够反映真实的真实和本质。换言之,在语言之外,有一种先于人的、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先验的存在,文学反映的正是这种存在的真实和本质。然而,这种先于语言的真实和本质并不存在,或者说,在语言的表征和模仿发生之前它并不能自动地、直接地呈现在人的面前。因为,不经过语言,任何真实或本质都不能成立。说到底,所谓的客观真实只能是一种主观假设,因为人们的思维离不开语言,而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了“语言的牢笼”——一种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固定意义的关系网,决定着他的存在的地位,决定着他与自然、社会、历史、他人和自我的关系,也决定着他的行为及其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因此,人并不是自由地支配语言,而是被语言支配,语言并不是一种死的、随手拿来可用的工具。

根据这种语言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和与之相关的文论,普遍抛弃了语言的表征模式。语言不再是对外在现实的模仿,不再反映真实和本质。所谓的真实只是语言构成的一个幻影。所谓的意义只能产生于语言本身。意义是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产生的,是语言符号排列组合的结果。于是,阅读和解释不再是“发现”真实和意义,而是“发明和创造”意义。这样,一切文本都不再有绝对的意义,失去了统一的核心,解释变成了一种自由的个人活动。

其实,这种转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众所周知,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强调主观和强调客观的争论一直存在,而且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因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争论,实质上是由不同视角和不同出发点引起的争论,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或此胜彼败。例如一个人手上有根刺,强调客观的人说,因为有刺,所以我觉得疼;而强调主观的则说,因为我感到疼,所以才发现有根刺。如果用于语言转向的问题,可以说:因为有客观存在,所以语言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或模仿;但是,如果人们意识不到这种存在,则这存在等于虚无,而如果意识到这种存在,就必须通过语言,所以存在是靠语言构成的。这听起来像是诡辩,但却充满了辩证。

那么,20世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语言转向呢?这同样应该从社会发展来考察。随着从现代进入后现代或者说计算机时代,整个社会发生了

巨大变化。计算机化的电子结构,巨大的商业网,无形的大系统,引起了可怕的新极权主义的前景:“居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将制造一个统一的、包括一切的、超星际的、为自动化而设计的组织结构。人不是作为自治的人而积极地发挥作用,而是将变成一种被动的、无目的的、由机器控制的动物,他们的正当作用……要么被机器吞没,要么因丧失个性的集体组织的利益而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人,他们不知道向何处去。他们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在意见方面混乱而踌躇,在行动方面分散而缺少连贯性。他们担心而又怀疑,但却不能集中他们担心和怀疑的目标。正是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使得以怀疑论哲学为基础的文论开始兴起,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达到了颠峰;同时,为了强调个人意识的作用,对抗大系统机构的垄断和控制,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理论如接受美学或读者反应批评,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承认和发展。

20世纪文论发展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文化转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商品化的出现,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的发展和运营方式,已经使经济权力开始危及到国家的统治,至少关于投资的部分决定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正如有些人说过的,比尔·盖茨在决定世界事务方面,有时超过了比尔·克林顿的权力。记得1996年中美贸易谈判时,双方各提出过一份商品制裁名单,中方的名单中包括福特牌汽车,但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声言,这种限制对他们并无妨碍,他们可以从加拿大或巴西的工厂向中国出口。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跨国公司的力量。

此外,随着后工业社会(或计算机时代)的发展,知识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知识的提供和应用,变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知识也商业化了。于是,知识生产力不仅构成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同时也使它成为世界权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很可能有一天会为争夺知识和控制信息而斗争,就像过去为控制领土、掠夺原材料或廉价劳动力而进行战争一样。这样,知识一方面为商业开辟了新的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政治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于是在西方出现了知识政治化的趋势,政府和各种机构竞相加强对文化的控制,结果在知识界激起了一股反垄断、反权威、反控制的浪潮,并由此激发文化研究,出现了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方面进行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

^① 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的神话》(1967年),转引自丹尼尔·霍夫曼编《当代美国文学导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7页。

简单说,这种理论关心的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人类经验的生成和再现以及人类主体的构成。今天,文化研究和它的发展现状一样,是一个各种学科混合的领域,同理论本身一样难以界定。可以说文化研究和理论并行不悖:理论是文化的理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或者说文化研究是文化的实践,理论是关于文化实践的理论。当前我们所说的“文论”,似乎也应该从这种意义上来考虑,而不仅仅局限于关于文字语言或文本理论。

三

就文学研究而言,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它过去一直存在,只是不那么集中、系统罢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文学的理论话语引起了一次根本的变革。如果说现在理论看上去是新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理论阐述行为是新的东西,而是因为当代批评作品的数量和品质的变化。当代理论最重要的特点有二:一是它的异质性,即各种理论并不求取一致;二是对传统批评的基础和设想进行空前的批判。美国著名批评家乔纳森·卡勒归纳为四个特点:一、它们是跨学科的——话语的效果在其原学科之外;二、它们是分析和思辨的——力图找出我们称之为性别、语言、意义、著作、主体等诸多事物的内涵;三、它们对常识采取批判的态度——批判那些被自然而然地接受的观念;四、它们是内省性的——对思想进行考察,探索人们使事物产生意义的范畴,既包括文学实践也包括其他话语实践。^①

文学研究一向是个多元化的学科。构成传统的各种实践,例如文学史、文学传记、道德—美学批评、新批评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一直在一种相当稳定的不平衡状态下共生共存,它们对作者、文学作品的性质以及批评的目的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认识。批评家对某一作品是否纳入经典可以进行争论,但对所谓的“文学”本身的存在并不怀疑,对作者决定作品意义的看法也不怀疑,对批评依附于所研究的文学对象也不怀疑。而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当代理论话语的严厉质疑和重新评价。

当代的批评理论认为自己不仅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且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它拒绝接受依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也不承认是更接近哲学的一种外部关怀。它把自己置于批评事业的核心,

^①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坚持认为一切批评行为都不能超越理论。正如许多理论家所指出的,研究文学所用的传统形式的批评,对文学名著的反应,不可能没有理论,也不会是纯学术的努力。所有形式的批评都依据某种理论,或某种混合的理论,不论它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理论著作已经表明,在文学研究中,那些常常被视为“自然的”、“常识性的”方式,实际上靠的是一套理论指令。对批评家而言,这些指令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不必在自己的实践中再加证实。

理论转化为文学研究日常工作之后,引起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有些批评家认为,理论深刻地隐含于文学研究的日常工作之中,隐含于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之中;另一些批评家认为,理论不应该直接指向研究的对象,应该在抽象深奥的领域运作,脱离细读和对作品的直接研究这些标志传统特点的方式。大部分理论是抽象的,不直接为探讨文学文本提供一种方法,但对文学研究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会因理论缺少直接的实用价值而被取消。文学批评学科基本上以与研究客体的直接联系为基础,但这是历史决定的,而不是必然的或自然的。对正统批评的部分抨击,涉及到研究文学的自然方式的确定。如果文学理论有时嘲讽它所抨击的传统,使它看上去像是单一的而不是多元的,那是因为它的抨击目标不是构成传统的那些批评实践的多样性,而是它的基础,它的一整套基本设想——传统的批评顽固地坚持这种基础或设想只能是“自然的”和“可以感觉的”。

传统批评的基础是一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确定性,认为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每一个批评形式,都侧重于一个不同的方面。例如传记批评强调作者,历史或社会学的批评强调背景,新批评强调文本自身,道德—审美批评强调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们都接受广义的文学模仿论。就是说,对于生活和人类的生存状况,文学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映并提供所谓的“真实”。文学的任务是描写生活,以潜在的方式描写经验和情感。批评的工作是揭示这种描写的真实价值和意义。这里有一个悖论:这种描写包含在文学之中,但却需要批评活动把它揭示出来。

模仿论把语言作为一种透明的媒体,现实可以通过语言以美学的形式再现,并超越其文字的表述。这种语言观又与一种普遍的世界观相联系:人是世界的中心,认识是经验的产物。经验先于表达它的语言,语言只是表达它的工具。按照这种看法,文学是杰出个人的集体产物,他们能以语言表达人类普遍的、永恒的真理。换句话说,文学是少数精英的

行为。

当代的理论质疑和批判的正是这套基本的设想,并在批判实践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通过它们的批判,围绕文学研究的传统共识以及支持它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例如,女性主义把文化政治引入到文学研究,读者反应理论把研究的中心从作者和文本的关系转向文本和读者的关系,新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介入并干预社会,后结构主义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后殖民理论反对文化霸权,后现代主义推进多样性,等等。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更是从多方面理解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尤其在当前世界中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在一个由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混合的世界中,在一个由国家权力、媒体工业和跨国公司构成的世界中,文化生产如何运作?个人和群体的文化身份如何构成?人们如何受到文化力量的影响和控制?在多大程度上受文化形式的支配?在多大程度上或以什么方式可以把文化形式用于其他目的?在多大程度上人们能够成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主体?又在多大程度上人们的选择会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限制?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远远超出了传统批评的范围,但无疑会大大推动整个文学研究的发展。

如前所说,新的理论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它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乃至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新的情况,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便成了思想界和知识界的重要任务。于是,有见识、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对传统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从不同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和理论阐述,形成了多样理论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的繁荣局面。

实际上,正是各种新的理论思想的出现,才使文学研究拓展了自己的范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三十多年来,新的解读经典作品的著作成倍增加,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大大增强了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对于这种情况,我以为应该持欢迎的态度,参与的态度,而不是倒退到过去,固守已经被证明过于狭隘的传统批评,更不应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态度。当然,传统的批评也有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继续坚持。但不要采取压制别人、压制新型理论的态度。为什么不允许多样批评同时存在呢?为什么要搞“一言堂”呢?你可以坚持你的做法,可以用你的成果去说服别人,而不要指责别人的做法甚至限制别人的做法。记得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曾发生一

场争论。那场关于西方文化概念及课程设置的争论,最终以多元文化的胜利而结束。所以我想,对待“西方文论”也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四

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有的教授写关于香烟的书,有的现实主义专家谈系列谋杀,有些诗歌研究者写艺术评论,还有一些文学教授从弥尔顿转向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肥皂剧,整个放弃了传统的文学研究。这一现象现在统称为文化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说,这与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如前所说,就其广义的概念而言,文化研究是理解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尤其在现代世界中文化的作用和功能。一般来说,文化研究包含文学研究,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来考察。但这种包含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许多有待论证的东西。是否因文化研究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潜力,在文化研究中文学研究可以获得新的力量和洞察力?是否文化研究吞掉文学研究并破坏文学研究?

现代文化研究有两个根源。它首先产生于6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把文化(包括文学)看做是一系列的实践,其规则或常规可以描述说明。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写过一部文化研究著作《神话》(1957),主张通过从文学到时装和食品来研究文化实践,解读文化形象的含义,分析奇特的文化构成的社会功能。另一个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包括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如《文化与社会》),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建者理查德·霍加特的著作(如《识字的用途》),这些作品力求恢复和探讨流行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因为英国一向认为高雅文学才是文化,工人阶级的文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亡。这种恢复消失了的声音的计划,这种从下层写历史的计划,正好与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理论阐述相吻合。后者把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相对)视为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形式,把读者定位于消费者,说明国家权力的运作。这两重文化分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文化作为人的表达方式和文化作为强加于人的东西——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这种传统中,文化研究受到一种张力的驱使,一方面是恢复通俗

文化的愿望,把文化作为人民的表达方式,或者让边缘化群体发出应有的声音;另一方面把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强加的东西,作为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的构成来研究。一方面,研究通俗文化的关键是联系普通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东西,与唯美主义者和教授们所称的文化和生活相对;另一方面,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力图说明人民如何受到文化力量的影响和控制。

由于这种张力,文化研究特别注意有争议的同性或身份特征,注意构成身份的多重方式,也注意体验身份和传达身份的方式。因此,文化研究特别注意研究一些群体不稳定的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群体包括少数民族、移民、妇女等等。他们难以与更大的、自身身处其中的那种文化认同。所以,文化本身便是一种不断变动的意识形态的构成方式。

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个复杂的问题。理论上,文化研究无所不包:莎士比亚和摇滚音乐或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过去的文化和现在的文化,等等。但实际上,由于意义的基础是差异,所以人们与某种其他事物相对照来进行文化研究。与什么相对照呢?由于文化研究最初从文学研究衍生出来,所以回答常常是“与传统上设想的文学研究相对照”。在文学研究里,主要任务是解释文学作品,把它们作为作者的成就,研究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伟大的作品有特殊的价值。

但是,不论从传统上还是从其他意义上说,文学研究本身应该做些什么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自从60年代的新理论出现之后,文学研究一直是个有争论的、也常常被争论的学科,在这个学科里,各种各样的项目——有论述文学作品的,也有论述非文学作品的——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总的来说,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不存在什么冲突。文化研究产生于把文学分析的技巧应用于其他文化物质的实践。它把文化制品作为文本来解读,而不是作为摆在那里的物体。反过来,当文学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并将其作品与其他话语方式联系起来考虑时,文学研究也会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总的说,由于文化研究坚持把文学作为一种与其他表意实践相同的表意实践来研究,坚持考察文学所具有的文化作用,所以文化研究可以强化文学研究,使它成为一种综合的、互为文本的现象。

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还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所谓的“文学经典”——即通常在大学教授和研究的作品,或者说构成“文学遗产”的作品。二是分析文化客体适用的方法。

如果文学研究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那么什么还会成为文学经典呢?如果肥皂剧代替了莎士比亚,是不是应该谴责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主张研究电影、电视和其他流行的文化形式,而不是世界文学经典,是不是文化研究会扼杀文学研究呢?其实,迄今为止,文化研究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文学经典的某种扩展。今天大学教授的文学包括妇女写的作品,也包括历史上被边缘化的其他群体的成员的作品。这些著作(例如亚裔美国文学、后殖民英语文学等)不论是作为对传统文学课的补充还是作为分开的传统来研究,它们都常常被视为经验的再现来研究,也就是作为对所说的那些人的文化的再现来研究(例如在美国,作为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和妇女文化的再现来研究)。但这些著作凸现了这样的问题: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公认为由它表达和再现的文化?是否文化是再现的结果而不是再现的源泉或原因?

广泛研究先前被忽视的著作引起了媒体的热烈争论:是否传统的文学标准已经让步?选择先前被忽视的著作,是因为它们的文学成就还是因为它们对文化的再现性?是否是政治正确性而非特殊的文学标准决定着对所研究作品的选择?事实上,“文学成就”从不决定所研究的内容。教师教学时,决不会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世界文学名著,而是选择一些代表某种东西的作品:也许是文学形式,也许是文学史的某个时期,如英国小说,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或现代美国诗歌等等。正是在这种表现某种东西的语境之内来选择最好的作品。如果你要讲华裔美国文学,你一定要选择华裔美国文学中最好的作品。现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是人们选择作品的兴趣,即选择的作品既要表现一系列的文化经验又要表现一系列的文化形式。甚至可以说,对“文学成就”这个标准的运用,已经历史地被非文学的标准打破了。这些非文学的标准包括民族、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当前人们论述最多的一些问题,也包括“文学成就”这个概念如何在教育制度内发生作用的问题——这些都是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

如果文化研究变成支配性的,它的实践者不再从文学研究出发来进行文化分析,是否对文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呢?《文化研究》一书的编者卡尔·奈尔森在其前言里说:在文化研究中,虽然并不禁止文本的细读,但也不要求这种细读。然而只是不禁止细读,很难被文学评论家确认。由于脱离了长期以来支配文学研究的原则——即主要兴趣是个体作品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所以文化研究可能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性研究的社会学,把作品作为其他某个事物的实例和征象,

而不是对作品本身感兴趣,或者说会屈从于其他的诱惑。

在种种诱惑当中,最重要的是“总体性”的诱惑——即认为存在一种社会的总体性,文化形式是这种总体性的表达或征象,因此对它们进行分析就是要把它们与它们从中产生的社会总体性联系起来。最近理论争论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社会的总体性,一种社会—政治结构?如果存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如何与它联系?文化研究倾向于直接联系,即把文化产品看成是一种潜在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征象。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目的。进行文化研究的人常常希望关于当前文化的著作会对文化进行干预而不仅仅是描述。《文化研究》一书编者的结论是:文化研究者相信,文化研究的思想著作应该——也能够——形成某种差异,或改变旧的东西。实际上,关于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就有助于区分不同类型的文化客体的价值问题。例如,研究莎士比亚而不是肥皂剧的价值再不能认为是想当然的事情,而是需要论证的事情:不同类型的研究会获得什么样的成果?例如,是知识的训练还是道德的教育?这种论证并非易事。例如,德国集中营的司令官同时是文学、艺术和音乐鉴赏家的实例,就使企图要求特定类型的研究产生某种特定效果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而这些问题在研究中又必须直面相对。

其实,提出不同的问题就包含着对各种文化客体的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方式的解释和分析——例如把文化客体解释为一种复杂的结构或把它们读作社会总体性的症状——也各有其长处和短处。虽然鉴赏的解释与文学研究相联系,征象的分析与文化研究相关,但两种方式对两种文化客体都同样适用。对非文学著作的细读并不意味着对客体作文学评价,这与对文学作品提出文化问题意味着它们只不过是某个时期的文献并无不同。

总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二者并不对立。前者将文学研究的方法应用于其他文化客体,而后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与其他话语方式相联系也会获得新的活力。

“腹有诗书气自华。”个人的气质、知识、涵养,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质量和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引进新的阅读方式。固守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因为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